

王

WANG

富

FU

仁

REN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自

跨

世

选

王 富 仁 著

纪

学

人

文

集

存

跨世纪学人文存

王富仁

自选集

王富仁 著

“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跨世纪学人文存
王富仁自选集
王富仁 著

责任编辑:郑纳新
苏关鑫

封面设计:敬人设计工作室
吕敬人 张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889×1194 1/24 印张:14 插页:1 字数:308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5633-2776-2/I · 254

定价:26.00 元

出版说明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学人。学术所依托者，学人也。学人须由学殖养成，非纯由天资铸就。学殖者渐，天资者顿，而学术的规律是“渐”的。基于这个“渐”的规律，出版人便有义务在当代学术的积累与整理上做一份工作，以助成学术之进步。这是我们出版此丛书的初衷。

新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来，中国学术界涌现出一批新学人。他们大多有过对社会动乱与变革的体察，受过“西风”渐欲迷人眼的种种思潮的冲激，有过放眼望洋的踟蹰，亦有过躲进小楼的沉潜。他们在80年代初崭露头角，继而渐趋成熟。90年代以来，这批学人更以一种成熟的心态，对新世纪的学术前景作了从容的思考。由此我们也就有理由期望他们在步入下一个世纪的时候，成为新世纪通博的学术大家。这样的大家是现代化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因为一个民族，在其步入现代化的时候，尚不能对自身的存在作出健全、合理的解释与肯定，那便是崩溃的开始。学人的使命，究其根本正在于作出这样的解释与肯定。我们不能在拥有了技术之后却失去了精神。这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是可堪忧心的问题。

《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中国这一批新学人，多是这样的“心忧”之人，当其激切之初，曾踟蹰

于良知的煎迫;当其冷静之余,又沉潜于学理的涵泳。这样的“心忧”,是学界的好传统,也是中国学人最可宝贵的品质。他们的学术自选集,也许不一定能呈示其学术全貌,但肯定能够突出体现其宝贵的学术品质。我们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希望这样的品质能够在 21 世纪的中国学人身上传承下去。

“跨世纪”只是一个象征的说法,并不是说未被列入“跨世纪”的人就无权迈进下世纪的门槛。“跨世纪”只是意味着,我们对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昌明与辉煌有着多么热切的期许,以及基于这热切期许而履行的对中国文化建设重任的自觉的肩负。没有这样的自觉,便没有迎接新世纪的真正准备,也就没有了开创未来的现实基础。丛书收入的,都是人文科学工作者的著述,我们想:人类存在的价值,其终极尤须以人文的尺度来衡估。

90 年代的沉潜,也许意味着中国学术界已进入了一个转型期,这样的转型是承前,也是启后。在这个重要的时期,我们出版这套“跨世纪学人文存”,旨在尽我们的薄力,倡学术之昌明。

是为说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九七年九月

丛 书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元化	王铁崖	张岱年	张政烺
李学勤	陈岱孙	周一良	季羨林
费孝通			

我走过的路(自序)

我是在1978年考取了西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之后正式开始学术研究的。此前在山东省聊城四中当语文教师的时候,也曾写过几篇有关鲁迅作品分析的文章,参加过薛绥之教授主编的《鲁迅杂文中的人物》的编写工作,但用现在的眼光看来,那还不能算是“学术研究”,正像一个小偷要到一个大户人家去偷东西,先得站在院墙外面往里投几块小石头,那时的一些文章起的也就是这种“投石问路”的作用。从来没有收集过,这个集子里也不包括那时写的文章,但在这个期间,给了我热情关怀和鼓励的聊城师范学院中文系薛绥之教授,我是永志难忘的。没有他的帮助,我是连试探着写文章的勇气也没有的。当了研究生之后,“学术研究”成了自己的工作,不做也得做,不会做也得学着做,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个钟从那时起一直撞到现在。假若用句文人好用的话来说,就是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

我的“学术生涯”,实际上用老百姓所说的到学术界来“混碗饭吃”概括更为恰当。我那时实际是没有什么“思想”要宣布,没有什么“主张”要坚持的,只是想做篇论文,混得一张学位证书,好达到调换工作的目的。但我们那代的研究生是很幸运的,国家正在提倡改革开放,对知识分子的限制相应地放松了很多,外国文学也不被当作资产阶级文学一律加以排斥了。时代是一种初春的气候,越冬的大树还没有发芽,有远大发展前程的新株还没有长成,我们这些在严寒中被冻僵但侥幸

没冻死的种子露出的一点绿意,就成了人们容易看到的东西。我在大学学的是俄文,对俄国文学多多少少有些了解,鲁迅又是我当时的研究对象,于是就选了“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这个题目。心里没有多大的顾忌,写的也就比此前的同类文章随便些,很难说有什么独立见解,但这点“随便”的态度与当时的改革开放精神无意之间便有了关系。大概也是由于这么一个原因,我的《鲁迅前期小说与果戈里》、《鲁迅前期小说与契诃夫》、《鲁迅前期小说与安特莱夫》等几篇文章发表之后,颇得了几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前辈学者的鼓励,而给我最大帮助的除了我的导师单演义先生之外,则是《文学评论》编辑部的王信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樊骏先生、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的王德厚先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杨占升先生,是他们,连拉带拽地把我拖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的全文,后来得以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本书所收的《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就是它的第一章的综论部分。它曾作为向北京鲁迅诞生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交的学术论文而收入《鲁迅诞生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现在看来,它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但作为我在学术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对我的意义是重大的,故而我仍然把它收到这个集子里。

我对“学术研究”开始认真起来,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了我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一文之后。它对我的意义,是使我开始有了一点“自我意识”。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上帝忘了播种、施肥和灌溉的一代人。讲学问,我们不如我们的爷爷辈、叔叔辈,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多、那么深厚的学问根基;论思想,我们不如我们的弟弟辈和儿子辈,他们没有我们这辈人的思想负累,一开始接受的就是新时期的思想教育。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舞台上还能不能扮演一个角色、起到一点作用呢?在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无意之间使我发现,我们这一代人还是能够做一点事情的,那就是从对中国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的表现上对中国文学作品做一点新的研究。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里,正是中国文化翻了锅的时候。正像一池子清水,被人用棍子搅了几搅,把积淀了几千年的残枝败叶、污泥浊水都搅和了起来。里面的鱼也无法

生存了,纷纷浮上了水面,大的、小的、黑的、白的、肥的、瘦的、善的、恶的,统统漂了上来,这个池子里都有些什么鱼,人们一眼就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能不说,这对于我们,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正像不慎掉到了井里,反拣到了一个早已遗落在井底的金镯子一样。从方法论的角度讲来,我们的爷爷辈和叔叔辈重视的是这种主义和那种主义,我们重视的则是在各种主义背后的人。我们的弟弟辈和侄儿辈,则成了新的主义的输入者和提倡者,他们的文化视野更宽广了,但讲的又是这种学说和那种学说,在这时,中国人大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文化面纱,不必赤裸裸上阵厮杀了。对于中国人的认识和感受,他们反而不如我们这一代人来得直接和亲切,至少暂时是如此。所以,从人的角度讲文化,讲文学,就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趋向。这点“自我意识”对我后来学术研究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我尊敬我的学术前辈,但也不愿受前辈人的束缚;我羡慕我的学术后辈,但也不因之而自暴自弃。这与我的这点“自我意识”是有莫大关系的。1982年,我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李何林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后,就以这篇文章为基础,写成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它的全文后来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为题出版,本书中所收的《〈呐喊〉〈彷徨〉综论》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摘要,曾单独在《文学评论》上分两期连载。现在就把它作为我这个时期的学术“成果”收在本书里。

在《〈呐喊〉〈彷徨〉综论》中,真正属于我的观点的实际上只有一点,那就是区分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并把鲁迅放在中国现代思想革命的历史潮流中来理解,来分析。从现在看起来,这也成了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在当时,它却引起了一点小的风波,有的教授和学者甚至加给了我一个“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鲁迅研究”的罪名。对别的人,这当然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对于我,却是不能忽略也无法忽略的大事。它的直接后果是把我卷入了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斗争的漩涡之中,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在学术文化界的境遇和环境条件。从那以后,我再也无法把自己当作超脱于现实思想斗争的“自由人”或“第三种人”,再也无法把自己意识为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纯正的教授和学者。它使我自觉不自觉地认识到,我是属于一个思想文化阵线的。这

个阵线是什么？由谁做首领？我并不知道，但我的思想文化倾向并不是所有人的思想文化倾向则是毫无疑问的。自然有了不同的思想阵线的感觉，紧接着的问题就是不同文化阵线之间如何进行学术对话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我是颇下过一番钻研功夫的。我不轻视马克思主义，更不敢轻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认为，不论什么主义，也得有益于中国人对现代世界和现代中国的思考和理解，也得有益于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主义，是不能成为标准和法则的，标准和法则永远存在于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人和人的要求里。自然“不断变化着的人和人的要求”是人类学术活动的基础，那么，我就不能把自己定格为一个教授和学者，甚至也不能把自己定格为一个知识分子。这只是我的一种偶然的职业选择，而不是我的基本的身分和立场。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是一个中国人，并且是一个现代的中国人。用句中国老百姓常说的话说来，我作为一个人，就得说“人话”；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得说“中国人的话”；作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人，就得说“现代中国人的话”。假若说这也算是一种学术思想的话，那么，这就是我那时明确起来的最最根本的学术思想。我想，“现代中国人的话”应是什么样子的呢？现代的中国人至少得希望现代的中国人生活得逐渐好起来，希望现代中国的社会逐渐地完善起来。经济的现代化，政治的民主化，思想的自由化，是现代中国社会逐渐完善的根本标志，也是现代中国人生活得更加幸福和美满的基本条件。这三条，得是现代中国人相互对话的基础。脱离开这个基础，我们就说不到一家去了，学术论争也就不是学术论争，而成了用学术吵架。

我是从鲁迅研究开始我的学术研究的。鲁迅同时有两个侧面：一个是作为思想家的侧面，一个是作为文学家的侧面。而我，是更为重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的侧面的。这使我与我的学术同行们走了一个不完全相同的学术道路。与此同时，我在大学学的是俄文，对中国现代文学实在是一窍不通，直至现在，除了鲁迅的作品，我读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是很少的，读的中国现代的理论著作就更少。说句实话，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教授，我是有愧于我所执教的北京师范大学的，也是有愧于我的学生们的。博士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写的有血有肉的现代文学研究论文很少，而写的干巴巴的抽象论文颇多。我知道，很多人不

会喜欢我的这种倾向,但对于我自己,却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本书第一部分收的就是其中的四篇文章。《两个平衡、三类心态,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不断运演的动态过程》写于80年代后期,我企图解决的是如何观察和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脉络问题。两个平衡的问题是我首先提出的,但也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近现代的中国,在世界的范围中一直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它迫使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起而克服它,改造中国文化,但这种改造总是从一个方面、一个部分开始的,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化内部的不平衡,而另一些知识分子则企图在现有的基础上恢复中国文化内部的平衡,但这种努力却维持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外部关系中的不平衡状态。我认为,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都是在这种周而复始的运动中进行的,从而也产生了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三种不同的文化心态:慕外崇新的文化心态、传统文化心态、中西融合的文化心态。紧接这篇写的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逆向性特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逆向性特征》,这篇实际上分析的是在慕外崇新的文化心态下造成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发展的特征。因为我认为,推动着中国近现代文化和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主要是一些具有慕外崇新倾向的知识分子,他们首先从羡慕外国、崇拜外国开始,但自己是在中国文化的教养之下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往往首先接受的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教条,直到这种理论和教条在中国变得并不新鲜,并不“先进”,它才真正结出了文化的果实,而在这时,慕外崇新的知识分子可能早已抛弃了这种理论和教条,去提倡更新、更先进的东西去了。不能不说,这也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一个重要原因。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非常乐观,我这两篇文章是不那么乐观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中国知识分子在慕外崇新的文化心态下争取来的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带来的必将是传统文化心态的重新泛滥。因为我们在有了一阵子发展之后又不那么自卑了,我们中国人又有了骄傲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什么必要老是吹捧人家而贬低自己呢?现在的一切不如意、不安定,不都是由于有了改革开放才出现的吗?这个责任应由谁来负呢?当然应由那些有慕外崇新的文化心态的知识分子来负了。用传统的对抗外国的,用古代的修正现代的,就成了一个无法遏止的文化潮流。这里不是一个正确不正确的问题,而是哪种文化心态的

知识分子能够找到表现自己的机会的问题。但传统文化就能拯救中国吗？也不能！它未能拯救古代的中国，怎能拯救现代的中国呢？真正能够拯救现代中国的只是现代中国人在各个方向上的实际努力，学术文化只是这诸种努力中的一种，它起的是为不同的追求开辟思想道路或寻找社会空间的作用。到了90年代，思想的追求遇到了一个槛，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力迈过去了，而这时涌起来的是经济的大潮，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点乐观情绪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在80年代，即使提倡悲观主义的，也悲观得那么欢欣鼓舞，但到了90年代，即使那些主张乐观的，也乐观得酸溜溜的。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是鄙视工人农民的，认为他们很愚昧，只知道吃饭穿衣，没有高雅的精神追求，而到了这个时候，知识分子自己也成了穷措大，才感到仅仅有文化是没有用处的，钱才是最最实在、最最可爱的东西。我也是爱钱的一个，并且从来都爱钱，但我并不认为钱从此就成了一切，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没有事情可做了，就只能“为学术而学术”了。在这时，我写了《文化危机与精神生产过剩》，试图从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说明当时面临的文化危机。感谢我的山东的文学同人，特别是《文学世界》编辑部的王光东先生，他们在那种求趣味、讲时效的文化氛围中仍然发表了我这篇毫无趣味的干巴巴的抽象论文。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了文化发展也有一个周期性危机的问题，也有复苏、发展、繁荣、萧条等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走红”的是不同的知识分子。外国人说过没有说过同样意思的话，我并不知道，但在中国似乎还没有人这样说过，所以我很宝贵我的这篇文章。到了最近几年，用我的话来说，文化又有了复苏的迹象，但在这时，扮演重要角色的已不是原来的开放派，而是传统文化派。这时又是21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对21世纪文化的展望就不能不带上了传统文化派的文化印迹。这时一个异常诱人的文化口号是“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我不属于传统文化派，所以我也不同意这个文化口号。我认为这个口号颇具有文化沙文主义的性质。文化是全人类的，是由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化共同构成的，在原则上，不同民族的文化应当具有完全平等的地位，任何时期的文化都不能说只是哪个民族的文化。20世纪不是美国文化的世纪，21世纪也不会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里只有一个各个民族的人民如何谋求本民族文化发展的问题，

没有一个谁是世界的老大的问题。《影响 21 世纪中国文化的几个现实因素》就是针对这个口号而写的,由于文化环境的关系,我不能把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全部表述出来,但我认为,我提出的几个问题还不能算是老生常谈,所以我把它收在本书里。

如上所述,我的现代文学知识是极为缺乏的,但自己到底跻身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不能不想办法弥补自己的这个致命的弱点,所以从在西北大学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起,我就想在鲁迅之外再选择一个研究方向。那时选择的是曹禺的戏剧,并写了《〈雷雨〉的典型意义和人物塑造》一文,但写了这篇文章之后,就看到了朱栋霖先生的有关曹禺研究的文章。我想,我是不可能比朱栋霖先生做得更好的,就放弃了这个想法。但对曹禺的几个剧本,我是很喜欢的,及至博士研究生毕业之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之声》编戏剧研究专号,向我索稿,我才又写了《〈日出〉的结构和人物》。这两篇文章,我重视的是对一些人物的分析,其中或有与别人的分析不尽相同的地方,可供学术同人的参考。曹禺之后,我想到的是创造社,当时和我的学友罗钢合写了《郭沫若与西方浪漫主义美学》、《创造社与西方浪漫主义美学》两篇文章,后来搞到成仿吾和田汉才感觉到这个题目太严重了,中国现代作家真正能够称得上有“美学思想”的,恐怕是不多的,因而也就从此罢手。只是到了召开郭沫若的学术讨论会,我才又写了《创造社与中国现代社会的青年文化》。由于时间的关系,这篇文章写得很不充分,但我很宝贵我的这个想法。我认为,中国的研究者把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作家看得过于认真,就是因为忽视了青年文化和青年文学实际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文化和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决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化和文学的诸多特点。直至现在,对文化和文学有兴趣的还是城市青年,并且大都把它当作一种求生之道和成名之道,到有了固定工作,什么学术,什么文学,都成了一些屁事,背几句古诗,谈一谈中外作家的趣闻轶事,只是一种附庸风雅的手段,实际是不必认真对待的。甚至那些在学术和文学上成了名的,也因为有了自己的求生之路、吃饭之道,并不把自己的思想和艺术当成一回事,在社会上遇不到多大阻力,说,还是要这么说的,但也仅仅是说说而已,并不真的想去实行。阻力一来,他就可以“丢车保帅”,扔掉自己的思想和艺术,只留下一个作家和教授的名

号,继续过自己的小日子。这种思想,和列夫·托尔斯泰、尼采、左拉、马克思、弗洛伊德这类西方思想家的思想是根本不同的两种东西,按照西方思想研究的方式研究中国作家的思想实际是难得其中堂奥的。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在文化观念上发生的最大变化恐怕还只是城市青年两性关系的变化,其他方面,大都是形变而质未变。看起社会,看起人来,还是与中国古代的人差不多。我想,这是现当代文化和文学的研究者不能忽略的角度,故而把它收入了本书。对于搞艺术的人来说,音乐是个基础;对于搞文学的人来说,诗歌是个基础。而对于我,最外行的恐怕就是诗歌了。80年代末,我开始学着分析诗歌。原意是从分析中国古代的诗歌入手,一步一步地接近对新诗的了解,故而给《名作欣赏》以“旧诗新解”为题写了一些中国古代诗歌的鉴赏文章。但我的环境条件并不允许我再这样从容地、有步骤地做学问,因此在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明确的诗的观念的时候便写了两篇论郭沫若诗歌的文章,一篇《闻一多诗论》和一篇《冰心诗论》,这里收的《闻一多诗论》就是这一组文章的代表。时至今日,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是极为零碎的,不系统的,只是到了最近几年,我才想把自己的一些零碎想法连成片,连成线,但这样的成果还没有,只好留待自己今后的努力了。除了几篇电影评论的文章,《〈废都〉漫议》是我唯一的一篇当代小说的评论文章,有它的代表性,故也收入本书。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新时期的文学都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所以中国现当代作家大都喜欢用西方的某种主义说明自己乃至标榜自己,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也就自觉不自觉地跟着他们的声明走了下来。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把中国现当代作家称为什么现实主义者、浪漫主义者、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等等,等等,而对于这些概念的理解却是依照西方文学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但是,一个人所崇拜的,所学习的,甚至是着意模仿的,就等于他自己的实际面貌吗?实际上,崇拜、学习、模仿这些概念本身就标志着二者并不立于同一立场上,它们是两种形态而不是一种形态。用西方文学的概念描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必然带来一系列问题。用他们自己的作品说明他们自己,用中国文学作品实际反映出来的具体状况说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我们才能真正理清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思路。基于这样的

认识,我写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这个工作,还是我刚刚开始的一项工作,下面我准备写的,还有《中国新古典主义文学论》、《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西方自然主义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对于这个工作,我并不抱太大的希望。这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概念大换血的工作。我们已经用这些概念用了将近一个世纪,这不是哪一个人说换就换得了的。我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同原来的概念系统捣捣乱,以引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注意。我在《影响 21 世纪中国文化的几个现实因素》一文中曾经提出,中国 21 世纪的文化是走向独立的文化,我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要走向独立。所谓走向独立,就是不能停留在用人家为自己建立的标准衡量我们为自己做的事情。我们学习别人,是为了发展自己,不是为了更像别人。

到下世纪,我将做些什么呢?我心里还没有一个谱。但有一点则是肯定的,那就是:我将艰难地支撑住自己。

1998 年 3 月 10 日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目 录

我走过的路(自序).....	(1)
两种平衡、三类心态,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不断运演的动态过程	(1)
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逆向性特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逆向 性特征	(25)
文化危机与精神生产过剩	(44)
影响 21 世纪中国文化的几个现实因素	(63)
 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	(81)
《呐喊》、《彷徨》综论	(110)
《狂人日记》细读	(151)
创造社与中国现代社会的青年文化	(170)
闻一多诗论	(194)
《雷雨》的典型意义和人物塑造	(217)
《日出》的结构和人物	(237)
《废都》漫议	(259)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	(276)
主要著述一览表	(313)